

桂
堂
文
库

辜也平 | 著

多维牵掣下的 苦心雕镂

DUOWEI QIANCHEXIA DE KUXIN DIAOLOU

 人 民 出 版 社

多维牵掣下的
苦心雕琢

辜也平 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辜也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217-3

I. ①多… II. ①辜…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133 号

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

DUOWEI QIANCHEXIA DE KUXIN DIAOLOU

辜也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390 千字

ISBN 978-7-01-014217-3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福建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肇始于1907年由清末帝师陈宝琛先生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示福建高等教育的先河和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承传1908年筹设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5年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的学科积淀,历经百年建设,发展成为东南名校。

我校中文系与校史一样源远流长,主要由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文科、协和大学与华南女院等中文系科发展而来,于2000年改设文学院,现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三系。文学院的学术源流,既呈现了陈宝琛、陈易园、严叔夏、董作宾、黄寿祺诸先贤奠定的传统国学,又涵衍着叶圣陶、郭绍虞、章靳以、胡山源、俞元桂等名家开拓的现代新学,堪称新旧交融,底蕴深厚。其中,长期为学科建设殚精竭虑而贡献卓著者,当推前后执掌中文系务三十年的经学宗师黄寿祺(号六庵)教授和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号桂堂)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程,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稳步发展,屡有创获。由六庵先生和桂堂先生分别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点;1995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家教委确认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一举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博士点,2000年又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2001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3年获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此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级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各1个和精品课程4门,综合实力居全国同类院系的先进行列。

先师桂堂先生,1942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系国学名师陈易园、严叔夏先生之高足;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又师从文献学家李笠教授和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1946年获文学硕士后,受严复哲嗣叔夏先生举荐回母校执教,直至退休。1956年起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六庵先生操持系务,1979年接任系主任,至1984年卸任。先生从教五十年,早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1951年起奉命转治现代文学,晚年创立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桂堂述学》及散文集《晚晴漫步》、《晓月摇情》等,与六庵先生同为我校中文学科德高望重的鸿儒硕老。文学院此次策划出版两套学术文库,分别以两位先师的别号命名,不止为缅怀先师功德,更有传承光大学术门风的深长意味。

《桂堂文库》首批辑录11种,均来自我校现代文学学科群三代学者,包括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等学科。老一辈名师中,孙绍振教授以《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汇集他在中外文论、文艺美学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精品力作,姚春树教授则以《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显示精鉴博识的特色。中年专家有6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帆的《表述与意义生产》畅论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问题,辜也平的《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在巴金研究和传记文学探索上有所创获,席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中阐发学科史和思潮史的新见,潘新和专门论述《“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赖瑞云则细心探讨文学教育的《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的理论与实践,拙作《现代散文学初探》只是附骥而已。新一代学人有郑家建的《透亮的纸窗》、葛桂录的《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和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在各自领域显示学术锐气。原作俱在,可集中检阅我们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和治学风气,我作为当事人不宜在此饶舌,还是由读者独立阅读和评议吧。

汪文顶

二〇一四年夏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代引 先锋、常态与文学范式的转换 / 1

巴金及其创作研究

巴金的革命叙事与泉州的民众运动 / 13

《家》的版本流变及“异文”考察 / 39

传统叙事母题的现代语义 / 59

《随想录》:文学老人的沉思 / 70

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 / 90

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 122

现代传记文学研究

论郭沫若自传写作的现代意义 / 151

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 165

许寿裳与现代传记文学 / 181

陶菊隐名人传记的通俗叙事 / 195

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 / 217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民族特色 / 257

其他作家作品研究

《尝试集》历史地位的考察与思索 / 281

传记文学视野中的《朝花夕拾》 / 288

叶绍钧的生平、思想与创作 / 298

朱自清杂文创作初探 / 307

当代散文园地的艺术奇葩 / 314

沉重而感伤的文学旅程 / 325

学术与学科史研究

二十五年学科发展的历史缩影 / 345

另辟蹊径 独具风采 / 359

评《中国现代散文史》 / 363

原生状态的历史碎片 / 366

考镜源流 辨章学术 / 373

新的高度与新的开端 / 378

附录 第六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 385

后 记 / 391

代引 先锋、常态与文学范式的转换

对于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只要我们匆匆地浏览普通教科书的历史年表，或者走进图书馆信手翻翻尘封的报纸就会发现，在 20 世纪的每一个十年，几乎都有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当生活于信息化时代的我们回眸上一世纪，就不能不惊叹中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这百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从社会体制到生活方式，从思想意识到道德观念，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当初人们难以预料的巨变。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世界列强的虎视眈眈，枪炮相逼，封建末世王朝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时刻都使中国人感到灭种亡国的危机。朝野之中的有识之士为此进行了种种不懈的努力。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义和团的抗争到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在 1911 年推翻了满清王朝，从而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皇帝的退位并没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并没使中国人马上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于是有了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有了 20 年代的大革命、30 年代的抗日救亡和 40 年代解放战争，有了 1949 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共和国初年，中国的大地上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掀起了自力更生，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潮，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国气象。在“东方红”的歌声中，中国人终于以独立的新姿，站立在世界的东方。

但是,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也并非一路坦荡。冷战与封锁一方面使年轻的共和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华民族由此充分地显示出顽强的世界生存能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冷战与封锁同时也影响了世界范围的交往,隔断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文化往来,以至于在 80 年代初的开始改革开放和 90 年代的冷战结束之后,如何“与国际接轨”反倒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从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意识又越来越影响着整个社会,最后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爆发,导致了长达十年的“内乱与浩劫”。

“文革”结束之后,共和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终于使中国人逐步过上了富裕安康的生活,同时也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悄悄地发生着转变。发展与进步已不再靠过去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谋求,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也不是在过去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中进行,共和国迈着稳健的步伐跨入了充满机遇与挑战的 21 世纪。

就是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纪里,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一历史性转换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因素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新的文学的萌生和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因此说,中国的 20 世纪是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而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就是一种变革时代的文学。

但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因素,固然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赖以生成、发展的土壤根基,却又不完全是其多姿多彩本身。如果从文学本体的角度稍稍加以考察又可发现,在过去的百年之间,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的文学思潮,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8 世纪的启蒙主义、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进入 20 世纪之后出现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盛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几乎先后都在中国文坛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操演,有的稍纵即逝,有的几度辉煌,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五彩纷呈的写作技法在理论家的介绍张扬和创作者的刻意模仿之下各领风骚,相互消长。所以,文学本体以外的诸因素影响和文学本身的迅速变化

的相互作用,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具备了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特点。

丰富多彩使这个世纪的文学产生了无穷的魅力,召唤着人们去充分地认识和开掘蕴涵其中的瑰宝。但是,复杂多变却又给理解和把握这一世纪的文学带来种种的困难,当人们试图穿越时间的隧道进入文学的历史空间,经常会感到丰富的痛苦和自由的迷惘。所以,如何先从总体上把握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先在宏观上把握了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也才能进一步对具体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以及作家作品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

在很长的时期里,20 世纪中国文学是被切割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部分加以分别研究的。这种以时间为界限的研究使得人们普遍关注某一时期文学相对独立的阶段性特点而缺少对其渊源和走向的深入探讨,所以虽然在思潮、运动、作家作品以至文学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各有突破,但一般都缺乏对其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因而影响了对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①之后,不少学者积极开展了旨在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历史的研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但是,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命题提出之后的十几年间,中国文学又发生了一次当时的人们很难意料的变化。80 年代后期和整个 90 年代文学的历史走向,无疑已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②等宏观把握面临了新的挑战。而这种研究在充分注重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征的同时,对不同文学范式的质的特征却又有所忽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影响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丰富性的认识与研究。就是说,在充分注重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征的同时,研究者们实际上也还未找到一种既有利于整体性把握,又能恰到好处地观照到 20 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不同文学现象,有利于丰

① 参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 年第 5 期;陈思和:《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复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②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 年第 5 期。

富性认识的阐释方法或方式。

实际上,文学史研究是一种文学运动过程的研究,在宏观把握整体性特征的同时,加强几种主要文学范式相互消长的历史走向的研究,才是推进和深化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因为整体的复杂来自于个别的丰富,20 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变迁源于不同文学范式的更迭、交替和发展,而 20 世纪中国作家的命运又与不同文学范式的交替更迭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些主要文学范式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考察,并探讨其相互间的内在关系,无疑有利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命题的深化。

这里借用的,是现代科学哲学的“范式”的概念,用以区别涵盖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几种主要的不同形态文学的特殊的内在结构的全部内容。所以借用“范式”这一概念,除其开放的包容性外,更主要在于科学哲学及其范式理论给以的启示。以库恩为发端的现代科学哲学认为:在科学发展史上,每一次“科学革命”(范式转换)“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①。实际上,人类的文学活动和自然科学研究有某种相通的因素,它们之间有着大体相近的发展过程。同科学发展的历史一样,文学的历史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统一的文学范式,不同的范式也依照文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或更替着。文学的创造性活动总是在创造性的断裂和革命性的突变中产生质的变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同样也有为作家、文学批评家以至文学接受者所一致遵循的主导范式。

而库恩对科学历史的叙述给宏观把握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文学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一样,其发展并不是连续性的进步过程,而是间断性的转换过程,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新传统能从其中产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1 页。

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积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①。因此,不同的范式之间一般并不存在绝对优或劣的区别,新的范式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是新的进步。

几千年中国文坛所遵循的是一种载道式的古典文学范式,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开创了以人本主义、爱国主义为中心内容,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段,以现代白话文为载体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五四之后,在这种传统下生成的就是五四新文学范式。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高度一元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大背景下,文学领域全面实践和发展了延安文艺的精神,形成了一种单一的,以服务现实为主要目的,以歌颂为主要内容,以豪放、崇高为主要风尚的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这种文学与五四文学当然有着质的区别,但在许多方面,如服务现实、标榜通俗等却又与五四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70年代后期开始局部的尝试、80年代全面展开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进入新的转型期。相对于20世纪中国的其他运动或革命而言,这是一次平稳的社会变革过程,但它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深远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也开始由历来那种相对统一或高度统一的一元统领的时代进入多元共存的时期,中国文学长期担当社会历史重任的意识形态功能正在逐步减弱,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消费的功能正在逐步增强,而包括言说方式在内、属于文学本体范畴的诸因素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种可以暂时称为新时期文学范式实际上已经悄然形成。当然正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变革过程一样,这一次的文学变革也是在平稳的渐进中完成,而它给中国文学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却同样是巨大和深远的。这种文学范式的转换,也犹如M. H. 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是文学历史上文学惯例(conventions)和文学创新(invention)的周期性反复^②。而回眸过去的世纪,上述几种间断性转换中的文学范式,的确很难用一种文学标准,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因此必须彻底告别那种“革命”战胜“反动”、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②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urth Edi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p.34.

“先进”取代“落后”的文学史叙述模式。

更主要的是,范式理论的运用,还有助于推进几种主要文学范式相互消长的历史走向的研究。而加强主要文学范式相互消长的历史研究,正是加强和深化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因为整体的复杂来自于个别的丰富,20 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变迁源于不同文学范式的更迭、交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些主要文学范式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考察,并探讨其相互间的关系,无疑有利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命题的深化,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迪。

首先,旧的文学范式与新的文学范式有着“质”的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虽然新范式都是从旧范式产生出来的,一开始也都较多地借用了旧范式使用过的概念与方法,但它同时又赋予这些概念与方法新的含义和新的关系。例如从晚清以来,革命、人民、救国爱国等相关概念,以及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等相关的文学要求在各个不同的文学范式中一般都是被反复强调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范式中其所指是有很大不同的。单就“人民”这一概念而言,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历史中,它始终是作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和主要受众而被提出的。但是,五四范式中的“人民”一般来说是较宽泛地指向民众或者平民,共和国初年范式中的“人民”主要被限定在劳动人民或工农兵,而在新时期范式中,“人民”则似乎更多地包含了大众的含义。在前面两种文学范式中,文学家艺术家一般是不包括在“人民”这一概念中,他们要么在“人民”之上,肩负着启蒙的历史重任,要么在“人民”之下,承担着服务的历史职责。在新时期文学范式中,“人民”已经包含了作家文学家本身,他们也就名正言顺地服务于自我而自觉地自娱自乐。新范式一旦建立,其“质”的规定性也随之产生,所以,很有必要在新旧范式千丝万缕的关系中辨析出新的“质”的内容。

其次,对不同文学范式转换过程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文学历史的宏观发展。不同文学范式的更替虽不限于一种模式,但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种文学范式从萌芽到衰落,一般也必须经历类似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范式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非常态(先锋)→形成范式→成为常态→出现新的非常态(新的先锋)→被新范式取代”的转换过程。在“非常态”

时期,新的文学范式在旧范式之中萌芽,接着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与旧范式(常态)的对话中不断壮大,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在经历“范式的革命(转换)”之后,这种范式就完全取代旧范式,它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成为此后很长时期文学的“常态”。

如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所包含的白话文写作、科学民主精神,启蒙救亡使命等,的确源于晚清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种种不懈的努力,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对于古典范式的“常态”是一种“非常态”,在当时的文坛也可以说是一种“先锋”。但是,先锋未必都能成为新的范式,只有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作家汇成的五四新文学,才不仅是一种新的先锋,而且才具备成为新范式的意义。

又如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的最早萌芽,可以追溯到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因为这是对五四文学范式的质疑或“重新提问”。但萌芽只不过是微弱的非常态,并未能达到先锋状态。这种新范式的萌芽在与五四文学范式的不断交锋和对话中(如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在自身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过程中(如普罗文学的倡导与论争),日益发展,并且逐渐以先锋状态出现(如蒋光赤以及30年代左翼作家的创作)。而从延安文艺开始到1949年之前,这种先锋文学已充分具备范式的意义。但是,从范式的雏形到成为文艺界一致遵循的主导范式,成为常态,中间还经历了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建构期”。50年代初三次规模巨大的文艺批判运动对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的建构而言,发挥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变革作用。这期间,从旧“常规”时期过来的作家在被规范的同时也自发地参与了新范式的建构,从而加速推进了主导范式的确立进程。所以我认为,“常态”与“先锋”是文学范式转换中的两个关键性环节。

所以,按传统的文学史观念,我们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共和国成立以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文学范式转换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也只是相对于文学范式的历史性转变的宏观态势而言。如果把单一的文学史个案进行深入的考究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范式的实际转换远比一般教科书的描述复杂。比如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 1920 年正式宣布以白话为“国语”，并且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而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胡适也在 1922 年郑重宣告：文学革命运动已由过去少数先驱者的倡导、讨论的时期进入创造、建设时期，五四新文学传统似乎在这四五年间突然地成了文学家所共同遵循的文学范式。实际上，五四文学范式所包含的白话文写作、科学民主精神，启蒙救亡使命等都源于晚清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种种不懈的努力，五四文学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内建立起一种迥异于几千年文学的新范式，正是晚清以来进步知识分子不断探索、长期蓄势的必然结果。而如果单从传统的现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史的分别叙述，一般人也很难理解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何以能在短期内迅速确立，很难理解众多作家何以会在一夜之间，都从守望五四文学的个性精神迅速转变到遵奉和恪守新的文学范式上来。但是，如联系 20 年代初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倡导、20 年代后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30 年代的左翼文艺的兴起以及 40 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的展开，那么，我们不仅对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的迅速确立，而且对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的种种文学现象都可能会就有更为深入、更为全面、更为客观的认识。

第三，不同文学范式的转换规定了中国文学的宏观走向，同时也影响甚至改变着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历史命运。因为一种文学范式一旦建立起来，其“质”的规定性也随之产生。这种新“质”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集中体现，同时又规范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既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共同的文学选择，同时也选择（或接纳、或剔除）从旧范式中过来的作家。当新的文学范式取代旧的文学范式，成为文学家共同遵循的规则和标准之后，活跃于旧“常态”时期的文学家必须抛弃原有的文学范式，接受新的文学范式的规则 and 标准，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常态”时期的文学领域，成为新的“文学界”的一员，或者说才能为新的文学“共同体”所接纳，否则就被排除在文学领域之外。

这就像孙犁在读《胡适的日记》时所说的，“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①。而到了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基本建立之后，胡适则首先受到了全面的

① 孙犁：《曲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6 页。

批判。实际上,一般的作家艺术家在范式更迭之际也都同样面临着重新选择和重新被选择的历史命运。

五四文学范式建立,成为“常态”之后,近代以来在某些方面引领文坛时尚的王国维、夏曾佑、蒋观云、章太炎、林纾、曾朴、陈去病、柳亚子以及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们,无一不被排除在新的“文学界”之外;而另外一些如刘半农、叶绍钧等曾经活跃于旧“常态”中的作家则告别原有的范式,接受新的文学范式的规则 and 标准,进入新的“常态”领域,成为新的“文学共同体”的一员。

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建立之后,原来活跃于五四文学范式中的诸多作家虽然仍然留在大陆,并且大部分还列名于作家协会,但很多人已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也令别人满意的作品,所以在这新的“常规”时期他们实际上已经不是“文学界”的一员。而取代他们的,则是那些来自根据地、来自工农革命队伍的作家,或者在新的文学范式规则 and 标准培养出来的年轻作家。

在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和新时期文学范式的交替时期,固有范式中的不少作家在劫后之年似乎又回到了文坛,似乎为新的文学共同体所接纳。但实际上,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发挥“余勇”的时间都没超过 80 年代中后期,而新范式真正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至少也是在 80 年代中期之后。最典型的两个个案是,巴金的《随想录》完成于 1986 年年底,所以他还能以一种昂然的文学姿态与读者告别;孙犁的创作生命支撑到 1995 年 11 月《曲终集》出版,但最后只能怀着沉重而感伤的心情退出文坛。所以,在范式更迭之际,作家们都同样面临着重新选择和重新被选择的历史命运。

这实际上也表明,一种文学范式对从旧范式中过来的作家的选择(或接纳、或剔除),是与其“质”的规定性紧密相连的。叶绍钧所以选择五四文学范式,或者说五四文学范式所以能够接纳叶绍钧,主要由于他原有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平民性。巴金为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所接纳,很大的原因是他的大部分创作本来就属于“革命叙事”的范畴;老舍选择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原因则是他的创作所具有的“劳动人民”因素。而像沈从文、施蛰存、萧乾等当年被排除在共和国文坛之外,或者像曹禺等作家虽仍然被列名于作家队伍但长期苦无新作,也完全是他们原有的创作或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新的文

学范式之间不具备像巴金老舍那种与新范式的“可通约”成分。

总之,人类某一时期的理性概括往往代替不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考察研究文学范式的更替和转换正是为了加深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认识 and 把握。这种考察不仅有利于旨在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有利于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及其渊源走向的探讨;不仅可以加深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把握,也有助于对 20 世纪中国作家的命运变迁的历史认识。

(原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